DOI:10.13438/j.cnki.jdxb.2017.05.016

“社会记忆”的政治哲学分析*

李武装
(西安工程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8)

摘 要:社会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可分为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个阶段。时空属性是社会记忆的基本属性之一,伴随社会记忆产生、转换和消失的整个过程;不同的时空秩序决定了社会记忆的不同存在方式。社会记忆的政治之维包含两个内核:(1)社会记忆是一种话语权,这是社会记忆的静态内核;(2)社会记忆表现为一种权力博弈过程,这是社会记忆的动态内核。在政治哲学语境下,社会记忆的实质就是记忆的不同权力主体通过对话语的掌控在整个政治社会领域中的博弈;它不仅促进了社会从理念到事实本身的变迁,同时也是社会变革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社会记忆;政治哲学;时空;权力
在线杂志:http://skxb.jsu.edu.cn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章编号**:1007-4074(2017)05-0117-08
基金项目: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016C012);教育部高校示范马克思主义学院和优秀教学科研团队建设项目(16jdszk094)
作者简介:李武装,男,博士,西安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引用本文:李武装.“社会记忆”的政治哲学分析[J].吉首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38(5):117-124.

相对于个体记忆之单纯的印象感,社会记忆已经不囿于对历史的简单复制与回溯,而更多是各种社会群体在现有价值观念引导下,对“过去”进行刻意筛选和过滤的结果。也就是说,经由各种手段(特别是政治手段)的重构和刻写,伴随“历史间距”的发酵置换,我们对逝去了的那些人、那些事、那些文化传统等等,才能真正形成所谓的历史“积淀”、所谓的“历史意识”和所谓的“社会记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社会记忆就应当是那些被一定权力把持,让特定社群在特定时期普遍“信以为真”的历史。必须承认,让如此这般的“记忆”被普遍接受和认可,最终造就并带来“集体无意识”,显然不能漠视“现在”的力量,因为“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而从实际发用看,这样的社会记忆既可以集中展示过去生活中善与美的一面,来强化民众对传统的认同,加强共同体的凝聚力,也可以片面扩充其恶与丑的一面,来促成民众对过去的仇恨,激发民众的抗争斗志。因此可以说,社会记忆是多元权力和多元价值观在长时段中复杂博弈的结果。需要强调的是,社会记忆在大多数时候所呈现出来的终极面貌,确实如愿以偿地表达了强势政治权力的意愿,但也不得不承认,“反”权力的力量作为权力的孪生兄弟也作用于社会记忆,特别在非官方的某些领域,另类的记忆版本可能滋长得更加根深蒂固,流传得也更久远。限于学术积累,本文要讨论的问题有三:(1)社会记忆生产和再生产的流程如何?(2)社会记忆在何时何地发生?(3)社会记忆在政治维度中的本质意义是什么?下面具体展开爬梳析抉,希望得到学界同仁的批评指正。

* **收稿日期**:2017-04-26

一、社会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

社会记忆的生产与再生产流程大致可界分为四个阶段:唤起、重构、固化和刻写。四者具有逻辑上的先后关系:首先是唤起对过去的回忆;其次对记忆的内容进行重构,新瓶装旧酒,即为过去套上新的外壳甚至注入新的内涵;再次对新的记忆进行固化,用各种方式将之保存并给予其存在的认同感和合法性;最后通过在个人、族群和复杂社会政治环境中的刻写,将这些记忆保存起来并得到有效传承。

(一)社会记忆的唤起

社会记忆的唤起针对的是同一时空经验的大规模的趋同回忆,在此过程中,社会对记忆对象进行有目的的抉择。这种回忆并不仅仅着眼于过去,而是集中关切现在和未来,"现代意义上的历史意识的形成是以此为轴心摆动的"[1]483。康纳顿在分析个体记忆如何发挥作用时使用了"记忆申述"一词,并提出了三种申述方式:第一,个人记忆申述,指把个人生活史当作对象的记忆行为。第二,认知记忆申述,这类记忆不要求记忆对象是过去的历史,而要求记忆者对记忆对象的在场认知。第三,"再现某种操演的能力"[2]121,这是一种习惯性记忆,通过现场的操演向他人展现记忆的存在。我们从中得到的借鉴就是,社会记忆的唤起大致可分为如下三个层面:首先是集体回溯,把集体的历史当作记忆的对象。其次是集体认知,对历史在现阶段的意义进行挖掘,结合当前需要有目的地唤起对现在有影响力的记忆。最后是集体操演,这已经不仅是单纯的唤起行为了,而是连接了整个社会记忆的过程进行的行为,它不仅唤起了对历史对象的回忆,而且也造就并带来集体之高度统一的习惯记忆。

(二)社会记忆的重构

按照本雅明的说法,记忆并不单纯地再现过去,而是"拥有忘却和写入两方面"[3]399。社会记忆的重构过程就恰恰展示了"忘却"维度,同时也部分地执行着"写入"的功能。社会记忆通过剔除意欲忘却的过去,以及加入并不存在或者故意歪曲的内容,以重建历史的现实意义,最终使得传统在一个新的框架中得以延续并不断革新。吊诡的是,政治权力通过"重构"执行有利于其统治的操作的时候,社会其他权力系统也使用同样的方式来颉颃政治压力。从而,"在一个社会中,社会记忆不断地被集体创造、修正与遗忘。"[4]418 当然,重构过程也体现出社会记忆消极的一面,那就是,记忆"不断地卷入到非常不同的观念系统当中,所以,记忆已经失去了曾经拥有的形式和外表"[5]82。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记忆的重构,就是诸多观念系统对某种共同回忆对象的重新塑造,尤其是对其外在特征的重新装饰,并且往往是强者主宰重构的过程。重构必然性也在于记忆的残缺性和延展性。过去被当下的记忆唤起并非全盘再现,一方面,社会记忆的不完整性必然造就记忆的残缺性,另一方面,个体主动或被动的选择保留势必带来记忆的残缺性,从而社会记忆势必要对唤起的残缺记忆或修补或重塑,以达致记忆的完整性和系统化。而记忆的延展性则很大程度上来源于社会对传统的保持,过去的记忆可能在现在的框架中依然存在,但是框架本身已非从前,于是重构必须发挥作用来弥平这个断裂。

不仅如此,康纳顿还提出了重要的一点:"应当把社会记忆和最好称之为历史重构的活动区分开来。"[2]9 他认为,对历史学家而言,历史重构并不依赖社会记忆,而主要依赖个人理念,因为即使个体在面对群体体验的直接真实时,也可能做到视而不见。这或许也是权力拥有者同样持有的态度,诸如"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的历史事实在过去的每个时代都出现过,而社会记忆即使每次回忆起这些历史,当下性的自信或者盲目也能够将其忽略。"在极权统治下,可怕的不仅在于侵犯人的尊严,而且还在于这样的恐惧:可能再也不会有人真实地见证过去。"[2]11 当然,这种对社会记忆的遗忘实际上也开启了社会记忆的另一种重构——固化之旅。

(三)社会记忆的固化

固化并不单纯是对重构后的社会记忆的保持和巩固,它更重要的是作为一个赋予重构"合法性"以及造就认同感的过程而出场。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秩序中的个体"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的记忆"[2]3。看得出来,无论是政治权力颁布的制度法典,抑或民间力量负载的乡俗习风,都隶属社会记忆之合法化实现形式。换言之,社会记忆合法化进程就是实现历史记忆与当下社会经验在最广范围的合谋,并且以这种合谋进而共享来替换其他立场的记忆。事实上,社会记忆的分歧程度就是由这种共享实现的程度来决定的,共享程度越高,则社会记忆再生产的内耗就越小,纷争也就越少。社会记忆的合法化不仅从政治权力的互相妥协和认同感的渐次培养中确立,而且通过发挥宰制等手段产生。政治力量凭借其统治地位,打击甚至消灭其他单个领域的

社会记忆,巩固其政治记忆的合法性,并最终用过政府和法律确立为社会之新的记忆框架。

社会记忆的固化还表现在集体对异见的“同化”上,这种在流动中对社会记忆的保护积极主动地通过占领或者消解另一些社会记忆而实现。巴特莱特称之为“习俗化”,通过这个过程,“从外部进入群体内的文化材料逐步结合进该群休相对稳定的独特模式之中”[6]365。异见的被融合不仅体现出社会记忆的稳定性,也同时体现出社会记忆的变动性。社会记忆的固化从表面上看是强势社会文化的自我保存,其更深层次的意涵是集体无意识的表达,通过具有遗传性质的社会功能和社会内容的承继和持有,凝结成荣格所言的“集体精神”。简而言之,“合法化”和“认同”作为社会记忆的固化中两个主要维度,实质上体现为政治权力和社会权力对社会记忆进行保存和巩固的重要成果。

(四)社会记忆的刻写

“所有的开头都包含回忆因素……绝对的新是不可想象的。”[2]1 新的记忆通过当下的社会情态对传统精神重新进行判断,以选择是否继续记忆或彻底遗忘过去。在这个过程中建立起来的程序合法性,就构成所谓的规则制度、风俗习惯和法律等等。当然,这一过程是由个体——身体发微的。个体对“开头”和“回忆因素”等体认后刻写在自己身体上,然后扩散到整个共同体和社会。可见,在社会记忆形成过程中,刻写的意义不可或缺,其功能也无法替代。一如巴特莱特的“心理构图”范式:“每个社会群体都有一些特别的心理倾向,这种心理倾向影响该群体中个人对外界情景的观察,以及他如何结合过去的记忆,来印证自己对外在世界的印象。而这些个人的经验与印象,又形成个人的心理构图。因此他认为,社会组织提供记忆的架构,我们的记忆必须与此架构配合。”[4]48 也因此,我们认为,身体在重构社会记忆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非常巨大,身体实践铸就集体记忆,而如此这般的记忆与个人在各种仪式化操持中的行为和感受不无瓜葛。如此来说,铸就记忆的话语权力不仅能重构社会,而且能重构每一个新的个体,而个体唯一的反抗动力则取决于个体自身记忆刻写的途径、方式以及能力。

二、时空与社会记忆

社会记忆“从本质上说,只有在一定的长时段和大空间范围内才能充分显露并发掘其丰富的蕴藏和完整的规定性”[7]。时空属性是社会记忆的一个基本属性,在社会记忆产生、转换和消失的整个过程中形影相随,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社会记忆的对象必然是存在于一定时空之内的事物。第二,社会记忆的过程必然存在于一定的时空之内。相对于前者的不言而喻,后者具有较为复杂的存在方式和作用方式。

首先,在一定程度上,时空属性是谓社会记忆在不同层面和情景中的呈现:时间对应着记忆,空间对应着社会。空间和社会是一对密切相关的概念,“空间是一种社会的产品,每一个社会和每一种生产模式都会生产出自己的空间”[8],两者共同组成了社会空间。鲍曼认为,“它应当被看作三种相互交织,然而又截然分明的过程的一种复杂的交互作用——认知的、美学的和道德‘间距’的过程——和它们各自的产品”[9]171。三种向度的空间构成了社会记忆中共存的多重场景。在它们所依托的“物理”性质的社会空间的相关记忆中,个体记忆和家庭记忆仅仅属于社会记忆的边缘性和起始性构成部分,而社会记忆的核心和主体是群体记忆。此处群体是指人类社会所包含的各种实质或者虚构中的共同体,不仅包括有着契约和法律内涵的国家领域,有着习俗和历史内涵的民族领域,也包括有着经济和文化内涵的市民社会领域,同时还包含伴随科技进步出现的网络虚拟空间中由网民组成的各种共同体等等。与这些共同体相对应的则是一些特定的空间范畴:领土之于国家,民族聚居地之于民族,城镇之于市民社会,网络空间之于虚拟社会等等。这种空间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宽泛的“地景”,在其中,社会文化和政治权力等人类行为的基本征候彰显出巨大而特有的意义。对于社会记忆而言,它承担了两种责任:“地景的塑造被视为表达了社会的意识形态,然后意识形态又因地景的支持而不朽”[10]35,政治权力在地景中积极运作,影响着整个社会结构。在这个过程中,需要“同时考虑空间关系和时间关系,否则无法形成地景的观念。地景是连续的发展过程,或是分解与取代的过程”[10]28。

其次,在诸多社会记忆中,时间秩序和空间秩序并行不悖,甚至凝合成一种秩序存在于社会记忆之中。比如祭祀作为古代国家最为重要的社会活动之一,必须在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才能进行;学校、博物馆、展览馆、音乐厅和其他类型的场所(譬如监狱和医院等)不仅具有特定的存在空间,而且还具有各种时间性规定,而不同的纪念日、节假日或者宗教中的特殊日子也常常对应着不同的空间,

如国庆和广场、春节和家庭、礼拜和教堂等。尽管社会记忆中时空统合的例子司空见惯,但一般可分成三种:一是时空并重,如报刊宣传、祭祀、宗教仪式等,它们并不受限于时间或空间。二是空间为主,时间为辅,如文化场所、监狱、陵园、医院以及纪念馆等特殊社会功能场所,在这些场所,空间主宰并孕育一定的时空秩序从而实现社会记忆。三是时间为主,空间为辅,如各种纪念日和节假日等,非特殊需要并不对空间作出限制性的要求。在政治哲学领域内,社会记忆所关切的时间和空间毫无疑问具有政治性,"关于空间和时间的制度安排是以各种共同体的形式存在的现代社会的一切制度的基础"[11]。某种程度上,不同的时空秩序决定了社会记忆的不同存在方式,下面我们就文化场所和宗教仪式展开个案叙述。

个案叙述之一:学校和博物馆等文化展现场所:集体学习的时空安排

学校和博物馆等文化展现场所中的社会记忆通常表现为集体学习。它使学生或者参与者在一定的秩序中学习指定的知识和技能,以构成和强化特定立场中的群体记忆。集体学习并不仅仅出现在学校和音乐厅、展览馆、美术馆以及博物馆等文化展现场所,它是各种群体都使用的记忆方式,只是在学校和博物馆等文化展现场所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其行迹和脉络也最为清晰。学校和博物馆等文化展现场所集体学习的具体形式和结果也存在很大的差别,学校的集体学习中所关涉到的记忆内容更多的和当下性联系在一起,受政治威权体系和社会综合环境的影响最大。学校在教授具有稳定性的普适内容之外,还在学生的学习过程中通过一些专门的教育模式和教育途径向学生灌输具有浓厚价值倾向性的知识和思维方式。在与意识形态相关的知识体系的遴选和教育中,这种倾向性表现得非常明显,所以在普遍的意义上而言,学校是带有时代烙印和在国家权力影响下的集体记忆形成场所,威权体制结构中的学校所执行的集体学习,实质上是"按照标准化的模式塑造人"[12]123。于是我们可以从不同时代学校教授的内容和方式的不同上管窥各种时代所表现出来的各不相同的社会记忆。

文化展现场所的学习内容和学习模式较学校更为形象化,也更具稳定性,偏向知识和文化的体现,较少意识形态和价值理念上的倾向。虽然音乐和绘画等艺术形式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丰富的抽象内涵,但它们作为一种表达某种含义的现实作品,是形象化的,在学习的方式上不是主动填充个体认知和改变个体的思维,而是更强调个体自身对作品的感受和思考,这种防御性的学习模式本身有着反威权教育的意味,因为强调和强化了个体性而对社会记忆产生了拒斥感。文化展现场所中展示的艺术内容或摆放的事物只是在意念中属于"现在",它实质上是"过去"的,大多属于回忆的内容。人们在认知它们的过程中势必回溯和它们联系在一起的"过去",所以在这种场所里的集体学习更多的是用现在的时空感受去穿透过去的迷雾,在实际效果上虽然造成了"过去"和"现在"的对立,但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和继承了过去的记忆。

虽然文化展现场所的具体展现内容缺乏政治意涵,但是这些场所的存在与运作又与政府的文化政策息息相关,在这个意义上,文化成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砝码。以博物馆为例,它是各种文化展现场所中储存记忆与再现生活的最佳场所。一般认为,博物馆记录了不同群体的时间和空间存在,大致可分为三种:一是集藏具有民族特色的物品的博物馆;二是叙述民族历史和构筑民族身份的博物馆;三是为国家提供权力象征或合法性依据的博物馆。它们分别对应三种不同性质的社会记忆:第一种是行业、生活习俗或艺术传统记亿;第二种是群体历史记忆;第三种是现有政权的体制记忆,"政权的体制记忆是最脆弱、最敏感的,它需要用国家机器来维持,而维持这种记忆的博物馆实际上就是一部意识形态机器"[13]。博物馆以物品陈列的方式规划了时间安排,在其中无时无刻地向参观者渗透各种价值观念,从而营造出一个"集体想象"的空间,成为重要的社会记忆场所。

不同时代的学校体制也许会存在很大的差别,分别铭刻着当时群体力量消长的结果,但不同时代的文化展现场所则具有很大的相似性,几百年前演奏的音乐现在也同样演奏着,而古老文明的文物不仅在博物馆里存在了几百年,还将比任何一种群体的生命更为长久地存在下去。这些场所所提供的记忆对象都是具有集体生活特征的符号,这些符号用沉默但是生动的话语代表和重现了过去的记忆,同时也渗透并影响着当下的记忆,甚至有些时候本身就是对当下记忆的反映,比如具有当下特征的音乐、艺术品或者电影等等。文化展现场所不仅是过去的记忆符号的存放处,同时也是新的记忆符号的制造所,它们以不同的时空流转方式生产和再生产着社会记忆。

个案叙述之二:宗教仪式:跨越时空向度的社

会记忆

在社会记忆的组成部分中,宗教记忆不仅重要而且典范,它被“推至由记忆、传统和家庭观念构成的总体的前沿”[5]149。宗教源自人类社会早期的图腾崇拜,它尽管经过漫长的社会变革,但宗教依然与图腾崇拜保持着某种共通性,那就是仪式[2]49。仪式是一种跨越了时空向度的社会记忆,它不仅在漫长的宗教发展过程中扮演着一个执著和忠诚的“书写者”的角色,而且与其他社会记忆保持着一定距离。哈布瓦赫认为,这是因为“作为建立宗教基础的真理,本质上都属于非时间范畴”,所以“宗教记忆整体上是以一种孤立的状态存在的,并且与其他的社会记忆更是互不相干”[5]153-156。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宗教记忆游离在社会记忆主体之外,而是说,宗教以特殊的方式实现着社会记忆,这种特殊的方式就是“一套完全由观念和传统制度铸造而成的教义上的,仪式主义的铠甲”,而铠甲的主人教会“通过本身就是记忆的表征,完善并阐明了更早的记忆”。所以宗教记忆“不是在保存过去,而是借助过去留下的物质遗迹、仪式、经文和传统,并借助晚近的心理方面和社会方面的资料,也就是现在,重构了过去”[5]199-200。可见,仪式是“社会群体定期重新巩固自身的手段”[14]507,宗教中的社会记忆通过仪式不断地被唤起和巩固。宗教中的社会记忆也不是孤立的,它和社会中其他形式的社会记忆紧密相关。宗教在提供个人信仰支撑的同时,还支撑了很大一部分个体和集体的记忆,因为“许多宗教观念不仅包含愿望满足,而且包含重要的历史记忆”[15]48,从而在世俗层面上,宗教记忆和个人的社会政治观念大幅度重合。

仪式在宗教中得到大规模应用的同时,还随之被推广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比如在个体、家庭和群体之中都有着众多意义各异的仪式:宣誓、集会、阅兵和庆贺等等。康纳顿曾经把仪式定义为一种“操演语言”,正是操演,构成了意识的主要意义。他认为,从仪式语言到身体实践的内化,因为操演本身就是通过固定的姿势或者动作让身体实行和刻写记忆。仪式的操演特征强化了纪念仪式这一特殊的仪式,纪念仪式更多关注纪念的原型,保持着权力的执行意志,“它的支配性话语并不仅仅是讲故事和加以回味;它是对崇拜对象的扮演”[2]81。在此,“思维观念和肢体仪式共存互生成为社会记忆的一部分”[16]。

伯格森(Henry Bergson)后来补充了“操演”的概念。他区分了两种记忆:第一种记忆以“记忆形象”的形式记录我们日常生活中各个时代发生的全部事件,它不忽略任何细节,它保留着每件事实、每个姿态的时间和地点。第二种记忆“总是受行动的支配……具有产生真实运动所要求的明确次序和系统特征。实际上,它已经不再对我们表现我们的往日了,它表演我们的往日”[17]65。

康纳顿总结出的是仪式的“操演”特性,而伯格森总结出的是习惯的“表演”特性,两者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都指出了社会记忆的重复和表现的特征。集体记忆可以被看作是一种动态的“操演”或“表演”过程,但不仅是回溯过去,更重要的是应用于现在和将来。我们可以将这个集中了大量“仪式”的行动过程看作一种“习惯”,而“习惯”的重要特征是个人在身体和心灵两个方面对记忆主体的屈服。社会记忆在形象记忆过程中是对过去的静态保存和“知识化”,而在行动记忆中则是动态重构和“习惯化”,两者能够很好地服务于同一种目的。它们只有程度上的区别,并没有类别上的差别。

三、社会记忆的政治之维:政治遗忘视域中的话语权与权力博弈

社会记忆的政治之维包含两个内核:第一,社会记忆是一种话语权,尤其是通常表现为一种话语霸权,这是社会记忆的静态内核。第二,社会记忆表现为一种权力博弈过程,这是社会记忆的动态内核。哈布瓦赫认为,“言语的习俗构成了集体记忆最基本同时又是最稳定的框架”[5]80。所有的社会记忆都是在语言环境中得以发挥和实现的,从一个广义的角度上来看,所有的图形和动作等都可以被看作一种特殊的语言,都是由符号构成的话语体系,夹带着显而易见的权力倾向。哈氏同时认为,“不存在没有词语对应的回忆。我们谈的是浮现于脑海之前的回忆。正是语言,以及与语言联系在一起的整个社会习俗系统,使我们每时每刻都能够重构我们的过去”[5]290。于是不仅社会记忆的唤起需要用语言来实现,即使是社会记忆的重构也是在语言的框架中实现的,当然哈氏并没有把记忆的过程描述完整。固化和刻写的过程,依然是通过语言来完成的,固化是话语权的确定,而刻写实际上是把记忆通过词语书写在人的身体和社会习惯中的行为。

语词力量在社会记忆中发挥影响力的主要表现是权力尤其是政治权力的博弈,“记忆是社会中不同人群争夺的对象,也是他们之间权力关系的指

标”[18]111。“控制一个社会的记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权力等级。”[2]1。权力各方通过各种手段不遗余力地争夺对社会记忆话语权的掌控便是出于这个缘由。“政治遗忘”是社会记忆中权力博弈的一个不可忽视的目标,它不仅显示出那些遗忘的事物是被政治力量“仔细地、断然地、恶意地篡改和抹杀”的[19]65,同时也显示出社会记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遗忘过程:“人们应该记住些什么……以便用它反对人们实际上想起的东西,反对被记起的东西。”[20]80 所以,有学者指出:“构建公共记忆的行为同时也伴随着忘却行为,忘却也是记忆的一部分。”[21]173 康纳顿以法国大革命为例指出:“新政权的渴望越是坚定,它越是专制地寻求引入一个强迫性忘记的时代。”[2]8 如此,政治力量通过对个体记忆的抹杀实现了集体性的遗忘。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遗忘可被视为“结构性失忆”在政治哲学范畴内有变动的应用,它通过政治力量的各种政治手段实现从个人身份到社会结构的境域变迁,同时也建构崭新的政治时空中的社会认同。

社会记忆在四个流程中不断地进行有目的的选择,以塑造出整个社会结构的记忆框架。政治遗忘是极其重要的选择方式,而“创伤”则是政治遗忘的特殊表现形式。耶尔恩·吕森从“创伤”的角度分析了集体认同问题:“它损坏了历史感知发生的框架,并阻止其重建一个新框架来填充遭受破坏的框架所具有的同样功能。”[22]创伤作为一种带有严重伤害性质的社会危机,造成了社会记忆的正常程序的破碎乃至断裂,并且使连贯性质的愈合变成不可能,这种带有彻底粉碎性质的“政治遗忘”往往是重构社会记忆的契机。创伤前的历史经验被创伤永远地阻隔在裂痕彼岸,新经验得以发生,不仅用来修补或者掩盖创伤,更重要的是形成新的社会记忆并且延续下去。在创伤记忆中,“不幸经历的嵌入造成‘意义中心’的瓦解,‘意义中心’是一个人的意识立义活动的生存论参照,具有潜意识的‘先验性’和‘自明性’”[23]42。这种创伤强调的已经不仅是断裂,而且是崩塌。它能够对国家意识中的个体起到毁灭性的打击,同时这种创伤由于具有特殊的历史经验性,从而本身就形成了社会记忆的“裂痕”,而对其遗忘和漠视则会彻底断裂不同时代之间的精神传承,同时也会造成创伤的再现,形成新的社会威胁。但在另一方面,创伤的存在也会成为重要的政治影响手段,比如战争纪念碑是国族创伤的永恒提示,但同时又是对国家英雄主义和光荣情感的崇高激赏,甚至在更高的层面上引导对政权合法性的认同。它实际上“是对创伤时代所含括的意义的深思,而并不仅仅是国家专断地出于讲述国家荣光的需要”[24]。在心理学意义上,创伤造成的记忆虽然持久且准确,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也会发生衰退和歪曲,主要是因为记忆是个以多元因素为基础而产生的复杂的构建产物[25]234。引申至政治学范畴中,社会记忆意义上的创伤记忆不仅会因为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发生变化,也会因为社会记忆本身具有的多元化发生变化。形成的是更大的裂痕还是逐渐得到痊愈或者忘却取决于对该创伤记忆具有最大影响能力的群体权力。

在社会记忆的权力争斗中,最大的对抗来自政府和民间之间的不同记忆模式。阿丹姆森区分了三种记忆模式:实录记忆、认识记忆和批评记忆[26]233。实录记忆和认识记忆类似于前文所述的康纳顿的个人记忆和认知记忆,而批评记忆实际上是民间记忆利用自身权利向政府追还权利的一种记忆方式,这种追还不仅表现在民间记忆颉颃抗政府记忆行为中,更体现在政府记忆本身的变革,其程度则取决于政府与社会之间的治理关系,后者恰恰是自由、民主等政治哲学概念变为社会目标的真正理据。对于政府而言,社会记忆“通常具有实质性的政治因素,其通过政府运作过程中各种事件得以广泛展现”[27]。批评记忆作为一种结合了防御性和进攻性的民间记忆,要保持其生命力就必须提高民间记忆者的能力和扩大其记忆的权利。在一些历史阶段中,民间记忆者不但不指认政治偏见,而且还被迫遭遇政治权力对其已有社会记忆的修正乃至遏制,遏制范围甚至延伸到私人个我的记忆方式。如此,民间记忆的内容和倾向就得到改变。需要指出的是,政治权力越是反对的记忆,越能引起另一些社会记忆的关注从而使得这些记忆被秘密保留,待到时机成熟时得到大幅度释放。看得出来,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扮演的角色彰明较著,而记忆者所拥有的记忆权利与该记忆的内容具有正比关系。我们认为,批评记忆属于一种反抗文化霸权的重要手段,其实现程度如何,则完全依赖于作为实行人的民间群体是否有足够的能力获得权利,来守护自己的记忆需求。

我们还注意到,社会记忆虽然能够形成习惯,能够在行动中继承传统,重构现代性,但是在时空的事物流中并非总是由权力完全统摄其发展。所以,现世的权力可以尽情书写的不过是当下性的社会记忆,而这并不能破坏社会记忆的另一种形成力量:不断处于“反”当下性的开放式的充满了未来主

义和世俗化英雄主义特征的私人性书写力量和民间书写力量。基于此,有学者就指出,社会记忆或集体记忆“包含着对往昔的回忆,它们由社会群体生产和建构,可被视为共享、讨论、协商、或经常是论辩的行为。记忆藉此也常和其他一系列行为联系在一起,包括伴随着简单回忆行为的身份建构、权力和权威、文化规范以及社会交往等。因此,只有在广泛的层面上掌握了社会、文化和政治行为的记忆,才能充分地理解它”[28]。

综上,我们认为,在政治哲学视野下,社会记忆的实质就是记忆的不同权力主体通过主宰话语体系实现对整个政治社会领域的统治。之于人类生活(或人类社会)而言,社会记忆无疑是其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是作为一个超级共同体的社会得以续存和递嬗的基本方式之一;它不仅促进了社会理念的更新,影响社会变革的节奏,而且本身融化到社会有机体的演进机理当中。在这个演进过程中,个人和家庭等私人领域的记忆,宗教和风俗等信仰领域的记忆,一并发挥了应有效用,当然最主要的还是政治力量的作用,那就是其通过掌控权力话语对社会记忆的深刻影响。质言之,社会记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影响着芸芸众生的记忆和生活,在最广阔的层面上影响着现在和未来的社会生活,在最具有颠覆性意义上重新书写“过去”的历史。也因此,我们必须正视并不断挖掘社会记忆在当代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阶段的新伟力,使其不断朝着有益于社会治理创新的征程上生产和再生产。

四、结语

社会记忆是人文社会科学最近 20 年研究中的前沿问题,也是热点问题。如何在理论梳理与文献分析中,以敏锐的中国问题意识和中国经验论述社会记忆,回应我们的历史记忆,尤其是创伤性的社会记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前提之一。本文只是介入此一问题的前提性考察和梳理,其进一步与中国问题与中国经验的展开只能期待后续完成了。

无论如何,在当代转型中国,社会记忆更应该得到本体性乃至“公共阐释”。因为当我们再一次站在“新的起点”上,我们的“社会记忆”反馈和提供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无论是创伤性的还是辉煌性的,都成为我们的宝贵精神财富和镜鉴之道。一代中国人有一代中国人的社会记忆,其影响有时是很深远的。只有熟稔并正视自己的民族历史和社会记忆,才能最终成为一个不断进步的民族。

引用文献:

[1] 福柯.主体解释学[M].余碧平,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2] 保罗·康纳顿.社会如何记忆[M].纳日碧力戈,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

[3] 三岛宪一.本雅明:破坏·收集[M].贾谅,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

[4] 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台北:允晨文化实业公司,1997.

[5] 莫里斯·哈布瓦赫.论集体记忆[M].毕然,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6] 弗雷德里克·C.巴特莱特.记忆:一个实验的与社会的心理学研究[M].黎炜,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

[7] 孙德忠.社会记忆论[D].武汉:武汉大学,2003.

[8] 汪原.关于《空间生产》和空间认识范式转换[J].新建筑,2002(2).

[9] 鲍曼.后现代伦理学[M].张成刚,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10] MikeCrang.文化地理学[M].王志弘,等译.台北:巨流图书有限公司,2003.

[11] 高丙中.民族国家的时间管理[J].开放时代,2005(1).

[12] 卡尔·雅斯贝尔斯.时代的精神状况[M].王德峰,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

[13] 徐贲.全球化、博物馆和民族国家[J].文艺研究,2005(5).

[14] 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M].渠东,汲喆,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15] 弗洛伊德.一种幻想的未来文明及其不满[M].严志军,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

[16] 纳日碧力戈.各烟屯蓝靛瑶的信仰仪式、社会记忆和学者反思[J].思想战线,2000(2).

[17] 伯格森.材料与记忆[M].肖聿,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99.

[18] 徐贲.文化批评的记忆和遗忘[M]//陶东风,金元浦.文化研究(第 1 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

[19] 福柯.必须保卫社会[M].钱翰,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20] 雅克·德里达.多义的记忆[M].蒋梓骅,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9.

[21] 黄东兰.岳飞庙:创造公共记忆的“场”[M]//孙江.事件·记忆·叙述.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4.

[22] 耶尔恩·吕森.危机、创伤与认同[J].陈新,译.中国学术,2002(1).

[23] 张志扬.创伤记忆——中国现代哲学的门槛[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

[24] Yaacovy. I. Vertzberger. The Practice and Power of Collective Memory[J].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2005,7(1).

[25] 丹尼尔·夏克特.找寻失去的自我——大脑、心灵和往事的记忆[M].高申春,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26] WaltAdamson. Marx and the Disillusionment of Marxism [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5.

[27] M. Kent Jennings, Ning Zhang. Generations, Political Status, and Collective Memories in the Chinese Countryside[J]. Politics,2005,67(4).

[28] B. Zelizer. Reading the past against the grain: The shape of memory studies[J]. Review and Criticism, 1995,12(2).

(责任编辑:粟世来)

Analysis of Social Mem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LI Wuzhuang

(*College of Marxism, Xi'an Polytechnic University, Xi'an* 710048, *China*)

Abstract: The production and reproduction of social memory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aspects: evocation, reconstruction, solidification and inscription. Time and space is one of the basic attributes of social memory, which is along with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isappearance of social memory. To some extent, the order of time and space depends on the existence of different social memory. The memory contains two cores: (1) Social memory is a kind of discourse, which is a static kernel of social memory; (2) Social memory is a process of power game, which is a dynamic kernel of social memory. In the context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the essence of social memory is to battle of the different subjects of power through the control of discourse in the whole field of political society, and it not only promotes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ety from the concept to the fact itself, but also is an important way of social change.

Key words: social memory; political philosophy; time and space; power

CNKI 推出《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

日前,中国知网(CNKI)中国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推出了一套《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该报告基于中国大陆建国以来出版的422万余本图书被近3年国内期刊、博硕、会议论文的引用频次,分学科、分时段遴选高被引优秀学术图书予以发布。据研制方介绍,他们统计并分析了2013—2015年中国学术期刊813万余篇、中国博硕士学位论文101万余篇、中国重要会议论文39万余篇,累计引文达1 451万条。根据统计数据,422万本图书至少被引1次的图书达72万本。研制方根据中国图书馆分类法,将72万本图书划分为105个学科,分1949—2009年和2010—2014年两个时间段,分别遴选被引最高的TOP10%图书,共计选出70 911本优秀图书收入《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统计数据显示,这7万本高被引优秀图书虽然只占全部图书的1.68%,却获得67.4%的总被引频次,可见这些图书质量上乘,在同类图书中发挥了更加重要的作用。该报告还首次发布各学科"学科h指数"排名前20的出版单位的评价指标,对客观评价出版社的社会效益——特别是学术出版物的社会效益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该报告从图书被引用的角度出发,评价图书的学术影响力,弥补了以销量和借阅等指标无法准确评价学术图书的缺憾,科学、客观地评价了图书、图书作者以及出版单位对各学科发展的贡献。

《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把建国以来出版图书全部纳入评价范围属国内首创,是全面、客观评价图书学术影响力的工具,填补了目前图书学术水平定量评价的空白,在帮助图书馆建设特色馆藏和提高服务水平、帮助出版管理部门了解我国学术出版物现状、帮助科研机构科研管理、帮助读者购买和阅读图书等方面,均具有较强的参考价值,也为出版社评估出版业绩、决策再版图书、策划学科选题提供有用的信息。

《中国高被引图书年报》由《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有限公司出版。该产品的形式为光盘电子出版物,分为理学、工学、农学、医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6个分卷,随盘赠送图书,欢迎您咨询、订购。咨询电话:010-82710850 82895056转8599,email:aspt@cnki.net。